

客观、专业、洞察

美国财税动态

月刊

MEIGUOCAISHUIDONGTAIMonthly

2019年第3期（第4卷第3期）



主办: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简介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编辑，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协办、专业提供美国当前财经运行动态、政策动向与思想趋势的期刊。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的办刊宗旨是，秉持学术中立，以专业的视角，客观详实、及时准确、动态全面地反映美国财政政策和运行、趋势、财经新思想及理论最新进展，政策性与学术性并重。

编辑出版《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的目的，以期为国家财经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财政政策布局，提供科学资料和决策依据，为我国财经理论与政策科学的研究、教学提供参考资料，并为发展外国财政学术积累基础数据并提供支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MEIGUO CAISHUI DONGTAI Monthly）每月25日在上海出版。



目 录

《华盛顿政治经济》	1
盟友质疑美国华为策略.....	1
众院民主党试图废除不利立法程序.....	1
《纽约邮报》赞特朗普兑现贸易承诺.....	2
贸易保护主义教训深刻.....	3
《利益集团与联邦财政》	4
共和党提削减强制支出.....	4
预算上限听证有利军费增加.....	5
绿色新政是预算杀手.....	6
“绿色新政”代价昂贵	6
两党讨论修订强制支出政策.....	7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8
共和党为减税成果喜形于色.....	8
税改与过渡时期.....	9
财政部关于第 163 (j) 条款的拟议规则	11
财政部关于外国税收抵免的拟议规则.....	12
IRS 发布 FDII 和 GILTI 扣除条例草案	13
高税率导致退休提前.....	14
关税影响作物保险.....	15
就业、减贫与税收抵免关系说.....	17
世界经济数字化的税收原则.....	18
加州拟征收数据税.....	19
《财经数据》	20
二月份就业报告乏善可陈，但经济仍保持强劲.....	20
二月份工资增速创 10 年来新高.....	21
美国农业部预测 2019 年农业收入.....	22
GIPC 知识产权指数有利于国际化	23
美国政府 2019 年 2 月预算回顾.....	24



盟友质疑美国华为策略

编者按：美国一直在阻止其主要盟友的 5G 网络建设使用华为设备，但这似乎是徒劳的。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最近的采访中表明了美方立场。他说：“各个国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 IT 系统中使用华为产品有风险。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系统设计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这会给国家、国防体系及人民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如果某国采用华为设备或技术、并应用在至关重要的信息处理系统中，我们将无法与之继续分享情报或合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无法共享美国资源、美国大使馆或美国军事前哨基地的定位。”

英德两国对美“全面反华为计划”不买账。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表示，华为的网络风险可控。该机构的一篇长文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确保英国电信网络安全的同时，不排除使用华为技术和设备来建造 5G 网络。

英国是否启用华为及其他供应商的 5G 设备建设，由政府通过对电信业供应链评估审查决定。目前评估还停留在收集证据阶段，审查报告将于今春公布，此评估严格遵循各项安全原则，是目前唯一决定未来英国电信网络如何建设与运营的政策手段。据《华尔街时报》消息，德国同样没有拒绝华为。德高级官员称，将不理睬美国警告威胁，考虑让华为公司参与到国家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

印度在美国威胁言论下似乎同样没有动摇。许多政府官员和行业领袖都先后表示，目前大多决策者和电信公司都没有被美方说服。许多人称，这些所谓威胁与华为极具竞争力的报价及科技实力相比不值一提。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印度 5G 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印度市场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美国希望削弱中国在未明确表明立场国家中的影响力，而接下来，印度这个南亚国家的选择将会对美战略产生直接影响。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印度会站在美国一边，毕竟中印两国的敌对关系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美国一直在抵制华为，目的是让其无法参与全球 5G 网络建设。但目前看来成效甚微。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五国组成“五眼联盟”共享情报。我认为：一旦“五眼联盟”中有一方使用了华为设备，美国真的就会不再与其分享情报了吗？一旦联盟出现裂痕，中方或成最大受益者。

(摘自 Allies question U.S. hardline on Huawei, www.axios.com, 2019 年 2 月 23 日，由王阳逸编译)

众院民主党试图废除不利立法程序

编者按：众院共和党人沿袭着百年立法程序，以帮助少数党改变或反对多数党的政策措施，民主党试图废除该程序，这暴露出民主、共和两党的重大分歧。

众院共和党人最近成功用“重启议案”修正了民主党枪支管制法案。修正案得到一些中间派民主党支持，要求在购买枪支时接受背景调查的非法移民，必须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

法部门报告。众院共和党人也成功地用这一方式，推动民主党人谴责与其无关的反犹太主义议案。共和党人 20 多次试图使用该议案，揭示了民主党内的重大政策分歧，其中包括更温和的首任议员。“很明显，他们这样做是策略，而不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贡献，”民主党新议员凯蒂·希尔（Katy Hill）说。民主党人，特别是一些自由派新议员，对共和党人利用“重启议案”使其在多数党的立法上留下印记而存在分歧。

该程序是众议院少数党对立法表示担忧的方式之一。美国国会研究处的 2012 年报告称，少数党议员可能会动议将立法转回委员会。2019 年 1 月，有 60 名民主党人开始了第一任期，其中 17 人签署了给佩洛西的信，试图化解共和党人对该程序的使用。一些民主党人希望禁止使用“重启议案”，因为共和党人自 2019 年 1 月成为少数派以来，一直在以这一方法为优势，共和党议员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说：“‘重启议案’取得了很大成功，民主党希望改变规则，把这个小小的程序策略删除，这在国会史上前所未有。”

民主党人所针对的程序可以追溯到 1909 年。众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指出，“重启议案”是“为了使少数党有权就重大公共问题对其立场进行表决”，“民主党为结束这一做法所做的努力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令人遗憾的是，民主党人正在考虑改变这一规则。民主党人不愿调和党内的分歧，而是想操纵规则，压制少数党在众院的话语权。“重启议案”还使少数党的议员能够要求将一项法案提交给议会委员会，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解决两院通过的立法分歧。

国会必须修正立法流程。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创建更透明流程、进行强力辩论，及建议两党完善立法，另外，我们随时准备合作，改进进程、终止“重启议案”的滥用。

（摘自 Rachel del Guidice, House Democrats Eye Ditching Procedure That Gives Republicans a Voice, www.dailysignal.com, 2019 年 3 月 6 日，由高丹翻译）

《纽约邮报》赞特朗普兑现贸易承诺

编者按：特朗普《2019 年贸易政策议程》筹划了美国国际贸易的相关事宜，敦促贸易伙伴遵守国际贸易相关规则，这是特朗普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体现。

特朗普总统发布了《2019 年贸易政策议程》。这份前瞻性报告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筹划将美国从不良协议中解脱出来，报告指出，数十年来妨碍国际贸易的薄弱防护措施和迟缓增长，兑现了特朗普在 2016 大选中的关键承诺：“经济投降的纪元终将结束……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工人将拥有一位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奋斗的总统。”

特朗普当局自 2017 年 1 月 20 日接手了残破的全球贸易体系。海外竞争者及外国政府偷窃我们的技术，不公正地资助国有大企业、向美国市场倾销产品。美国跨国公司亦将工作岗位离岸外包，令优秀的美国员工和制造业处于困境。中国于 2001 年加入 WTO 后，并未完全遵守 WTO 规则，其危害日益显现。美国随后关闭了超过 7 万家工厂，损失了上百万个制造业岗位。

特朗普就职后两年内迅速扭转了局面。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加紧对损害美国企业的外国补贴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论促使美国采取大胆措施保护钢铝产品，还对特定农业和制造品征收关税，以抵消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中国中的谈判表明，美国的贸易策略在促使这些

国家处理其恶劣的贸易行为方面行之有效。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美国已对价值 2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现在，中国政府终于忙着认真谈判，解决对美国商业网络的网络入侵、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货币措施，以及对国有企业的过度补贴等问题。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开拓新市场方面，仅去年一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与欧盟、英国和日本磋商新的贸易协议，2017 年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共 3500 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谈判也全面修订。在 1994 年 NAFTA 生效时，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将带来 17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在 21 世纪对墨西哥将保持贸易顺差。然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却在不断膨胀，且墨西哥本土工人并未因此受益。与此同时，NAFTA 压低了美国高度受影响产业的蓝领工人工资增速，并促使美国公司将其生产外包给墨西哥。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将促进对美国公司和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迁入美国，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大众都计划扩大在美生产规模，USMCA 有把握增加数千个美国就业岗位——如果国会在 4 月批准该新协议的话。

这些跨越式发展得益于特朗普总统为复兴美国贸易的不懈努力及宏伟战略。美国历任总统没有比特朗普更追求公平互惠，尖兵中没有比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更有执行力的，《2019 年贸易政策议程》是他们为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所作贡献之一。

特朗普的成果不容忽视。2018 年，美国新增 28.4 万个制造业岗位，是 21 年来增长最多的。目前，美国在 G7 国家中增速最快，为美国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提供了新机遇。2019 年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平衡国家贸易关系及确保强势协议。感谢特朗普总统信守承诺，美国贸易前景光明出前所未有。

(摘自 Peter Navarro, How Team Trump is keeping promises on trade, *nypost.com*, 2019 年 3 月 5 日, 由刘茵莹编译)

贸易保护主义教训深刻

编者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没有赢家，历次贸易战，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应从教训中总结经验，妥善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实现互惠互利。

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后果严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展示了这一最新的悲惨例证。2018 年 1 月，它裁定美国管道生产商受到中国和印度等国大口径管道进口影响，补救措施可能是提高关税。

特朗普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贸易伙伴出口的钢铁征收高关税。2018 年 3 月，贸易专家曾警告称，依据 1962 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 条征收的关税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制造商日子更加难过。加征 25% 的关税将显著提高美国公司使用进口钢材的价格。专家还预言，使用国产钢材制造商也将付出更高代价。事实证明这些预测正确。

但高成本对美国生产商难以避免。首先，进口钢铁类型可能不在美国生产，这意味着生产商必须继续以更高关税价格进口钢材。然而，即使进口钢材的替代品在美国生产，质量也可能不符合要求，或者价格更高。此外，尽管商务部已经启动申请豁免关税的程序，但事实证明，这一过程就是一场噩梦。

从加税中获得巨大收益的钢铁行业反对这种豁免。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克里斯汀·麦克丹尼尔（Christine McDaniel）和丹尼尔·帕克斯（Danielle Parks）记录的那样，钢铁行业的说客常常坚称，使用钢铁的美国公司不需要寻求豁免，因为钢铁生产商可以扩大国内产量。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对使用钢铁的美国生产商来说，豁免申请程序本身程序繁重，加之被拒绝豁免的公司缺乏追索权，难以产生积极效果。然后他们不得不为一项重要的投入付出更高成本。

最终，钢铁关税使得美国制造的产品更加昂贵。这使得那些使用钢材的美国生产商全球竞争力下降。美国管道生产商在国内生产大直径焊管和结构管时，使用的原材料要依据第232条缴纳关税(从加拿大、中国、希腊和印度进口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从土耳其进口的钢材征收50%的关税，韩国进口钢材实行配额)。正如预期的那样，管道生产商生产成本上升了。而现在，这些生产商又到ITC控诉，中国和印度制造商的倾销行为(在美国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销售)损害了它们的利益。5名委员会委员中有3名表示同意，这一裁决将导致美国商务部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税，其结果是所有东西最终都将更加昂贵。

这种连锁保护主义何时何地才能停止？钢材关税已经影响到大口径管道以外的产品。所有使用钢铁作为原材料的美国生产商都受到了政府进口关税的负面影响。那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商要求保护自己的产品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倾轧，而实际上，他们只需要保护自己免受特朗普政府贸易鹰派人士影响，因为正是他们增加了其投入成本。

没有人知道钢铁关税何时会取消。事实上，虽然总统认为他在利用这些关税作为杠杆，与其他国家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协议达成后并没有取消这些关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样，现代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各国已对这些关税采取报复性措施，即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大家的情况都更糟。我们一遍遍地见证这种恶性循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吸取教训呢？

（摘自 Veronique de Rugy, *Learning the Lessons of Protectionism the Hard Way*, *spectator.org*, 2019年2月28日，由沈淼编译）



《利益集团与联邦财政》

共和党提削减强制支出

编者按：众院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就特朗普总统2020财年预算请求发表评论，他赞同在预算中削减强制性支出的举措。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发布了特朗普总统“2020财年预算请求”之后，众院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发表了声明如下：

“正如我多次重申，如果我们不明白，真正推高赤字和债务的是强制性支出，我们就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财政挑战。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相机开支目前仅占联邦预算的30%，强制性开支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已经远超预期，也远超我们的负担能力，如果不对强制性开支

计划进行重大改革，相机开支将继续被挤占。”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国会两院议员齐心协力作出艰难抉择，使我国走上一条更持续的道路，确保强大国防，并维持和巩固美国人未雨绸缪的计划。特朗普总统的预算计划路径正确，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期待与 OMB 执行主任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的听证深入探讨这一议案，并与国会同事共同制定预算计划，在承认财政约束的同时，为重要优先事项提供资金。”

（摘自 Ranking Member Womack Statement on President's FY2020 Budget Request <https://publicans-budget.house.gov>，2019年2月7日，由林铃编译）

预算上限听证有利军费增加

编者按：2019年2月7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举行“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投资”听证会，讨论了国防和非国防相机预算的上限问题，出席听证会的人士认为，国防预算不应当削减，否则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美国政府2011年制定了2012-2021财政年相机开支上限，同年《预算控制法》（BCA）也随之出台。之后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一系列“上限协议”，这一上限又不断增加。2019财年是协议生效的最后一年，如果2020财年不出台新的上限协议，那么国防支出与去年的支出水平相比，上限将下降710亿美元（11%），而非国防支出上限则将下降550亿美元（9.2%）。

预算委员会核心成员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说：“多年以来，削减预算使国防安全严重受损，我们好不容易才再次让军队领袖和军人享有履行职责所需的各种资源”。在现行法律下，2020财年国防预算一旦削减，无疑将会直接危害到军人利益。

出席听证会的人士一致认为，削减任何国防预算都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以保证美国有足够实力对抗传统和非传统对手。根据新美国安全中心国防专家史蒂文·科西亚克（Steven Kosiak）说法，“710亿美元预算的削减幅度”将对国防安全造成毁灭性打击。科西亚克认为，国会不仅要阻止国防预算的削减，还应该防止预算的增加“在最低限度上赶上通货膨胀。”科西亚克的发言呼应了马蒂斯（Mattis）将军，他之前提出要每年增加高于通货膨胀率2%-3%的基本国防预算。他认为，这有助于“在人员、现代化和军备物资之间达成有效平衡，以此来实现国家全志愿兵役制的持续运作”。科西亚克还将国防描述为一项对抗对手的“保险政策”。他还表示，有关国防拨款的决定应该基于具体国家策略而不是刻板的预算上限。

听证会重点还包括当前财政情况，及避免可支配财政支出缩减上限协议。美国行动论坛财政政策主任戈登·格雷（Gordon Gray）强调，强制性支出是造成债务和赤字的主要原因。只要强制性支出继续增长，那么定将影响“全权预算支出项目”优先名单上前几项、尤其是国防支出。格雷认为，理想情况下，任何预算上限提升都会被《权利保障计划》改革抵消。接下来将举行有关《预算控制法》（BCA）预算上限研讨会。如果会期内强制支出项目改革不顺利，那么强制性支出（包括债息）预计将从2018年的2.8万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5.5万亿美元，持续挤出其他“全权预算支出项目”重要项目。共和党人重申，赤字和债务威胁着美国的未来和繁荣。由于强制支出是赤字和债务的主要来源，所以应对相关项目实施重大改革，应对财政危机，确保各个“全权预算支出项目”得到适当资金。

(摘自 Budget Digest: BCA Budget Caps Hearing, republicans-budget, republicans-budget.house.gov, 2019年2月12日, 由林铃编译)

绿色新政是预算杀手

编者按: 众院民主党人的“绿色新政”影响波及美国各主要经济部门,“绿色新政”措施涉及大量财政支出,会给国家预算带来巨大压力。

2019年早些时候,众院民主党人抛出了“绿色新政”(H.Res.109)。提案发起人解释说,这是一个“国民、工业、经济动员计划”,力求在10年内完全消除所有碳排放。事实是,这项提案将影响到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从能源、农业、制造业到交通、住房和医疗保健。就连提案拥护者都将其描述为“社会的巨大变革”。例如,提案提出,将保证所有美国人的住房和粮食安全,即使是那些不愿工作的人。保证具备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福利和退休保障的工会体制保护下的工作机会。建造横跨全国的高铁网络以替代航运。完全脱离所有化石燃料,消除建筑物和车辆的碳排放。用普适政府医保取代雇主健康保险、医保和其他民生计划。

前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主任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Douglas Holtz Eakin)研究表明,这项绿色新政“设计得尽可能昂贵”,十年成本可能高达9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预计每个家庭每年成本可能超过6万美元。一些支持者建议,将勤劳家庭的税收提高90%,以覆盖全面改革。但正如《投资者商业日报》社论指出的,“最终……即使将调整后总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纳税人的每分钱都拿走,都不足以覆盖成本。”哈特兰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写道,这一宽泛的计划可能“使我国陷入另一场大萧条,让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将美国梦变成一场噩梦。”

(摘自 Budget Busters: The Green New Deal, republicans-budget.house.gov, 2019年3月5日, 由林铃编译)

“绿色新政”代价昂贵

编者按: 众院民主党人的“绿色新政”社会经济影响非常大,其高昂代价引起了社会各方广泛关注。

最近一份关于“绿色新政”潜在成本的分析报告现实,“绿色新政”将在推行中将打破国家预算。该报告的执笔人前任美国预算办公室(CBO)主任霍尔·埃金(Douglas Holtz-Eakin)认为,这份影响广泛的提案将在十年间花费纳税人高达93万亿美元。

埃金(Holtz-Eakin)写道:“绿色新政显然所费不菲。它进一步扩展了联邦政府在日常生活最基础决策中的角色,然而,除了极其高昂的价码,还将产生更加持久的破坏性影响。”

以下是关于“绿色新政”的其他评论:

福克斯新闻:“……可不便宜。”

华尔街日报:“……怎么贵怎么来设计。”

福布斯:“它将花费一大笔钱,无论怎么对富人额外征税都不够。”

华盛顿邮报：“……对制止温室气体排放无所作为。”

哈佛研究所李·瓦尼安 (Lee Ohanian)：“……是一场白日梦，而不是严肃的政治提案。”

美国企业研究所詹姆斯·皮骚库克斯 (James Pethokoukis)：“总的来说，绿色新政就是在花钱。”

中心地带研究所嘉斯汀·哈斯金斯 (Justin Haskins)：“……将把美国送上经济悬崖，极度扩大联邦政府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

Karl Rove：“毁掉美国经济……一长串疯疯癫癫的想法。”

(摘自 Budget Buster: The Green New Deal, Part II, *republicans-budget.house.gov*, 2019年3月15日, 由刘茵莹编译)

两党讨论修订强制支出政策

编者按：强制性支出给政府财政带来极大压力，不加控制的强制性支出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未来发展，两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着手修订预算流程以解决这一问题。

众院预算委员会和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代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就特朗普总统 2020 财年的预算请求召开听证会，该预算请求已递交国会。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Steve Womack)指出：“虽然宪法赋予了国会财政大权，但在应对美国财政挑战的同时，还要为美国民众的头等大事提供资金并非一件易事。要做到这一点，两党议员、国会两院、及白宫与国会之间需要通力合作。”

众院共和党人重申必须要解决预算中失控的强制性开支问题。目前美国年度预算赤字接近 1 万亿美元，国家债务超过 22 万亿美元，众议员比尔·约翰逊 (Bill Johnson) 说：“美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债务不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强制性支出账户，几乎占了 70% 的财政支出，而我很欣赏这份预算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相机支出) 只占联邦财政总支出小部分，而且即便我们把相机支出降低为零，财政支出曲线仍然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众议员乔治·霍尔丁 (George Holding) 说：“强制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 70%，10 年内强制性支出加上联邦财政负债将会消耗殆尽我们的财政收入...如果不真正改革，强制性支出将继续挤占相机支出空间，留给国防等其他重要领域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少，而这些领域正是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代主任沃特也指出，必须解决好强制性支出问题，他补充道：“美国存在支出问题，这无疑是对我国安全和未来几代经济成功的最大威胁之一。现在是结束这种不负责任的支出时候了。”

随着预算流程推进，两党议员还提出有必要通过预算决议：“我看到有消息称，人们对多数党甚至有没有计划做过预算都存在争论。我希望质疑者明白，我理解他们的痛苦。我也曾这么想过。但是这就像是在质疑我们是否要工作一样。”高级官员沃马克说道。众议员杰森·斯宾塞 (Jason Smith) 重申说：“我希望对方党派领袖能够抽出时间提出预算案...这样国会才能投票决定预算...我们应该为民众谋利，把美国民众利益置于政治之上。”

沃马克知道制定预算决议并取得在国会通过的困难性。他说：“我和预算委员会主席发表了共同看法，因为 2018 年我们在预算和拨款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上共同主张对预算程序

进行改革。我再说一遍，现在的预算流程存在缺陷并且支离破碎，它需要改革。我们需要进行预算流程改革。”

（摘自 Lauren Aronson, Austin Stonebraker, Members Discuss Need to Address Out-of-Control Mandatory Spending, Fix Broken Budget Process, www.heritage.org, 2019 年 3 月 12 日, 由文月编译）



《利益集团与税收征管》

共和党为减税成果喜形于色

编者按：《减税与就业法》堪称美国近 30 年来最重要的税改，该法案对美国工人、家庭、公司的影响到底如何，众院预算委员会开始对法案的影响进行全面综合评估。

2017 年 12 月，国会通过了《减税与就业法》（TCJA），这是美国在将近三十年以来第一次对税法进行了修订。该法案满足了工人、家庭以及企业一直以来的需求，在减少纳税总额的同时，促进了就业和投资增加，推动了经济增长。

《减税与就业法》出台前，美国经济增速迟缓，工资增幅停滞不前，在工业化国家中公司税率最高，达 39%，小公司税率更高，将近 44.6%。税率不具有竞争性阻碍了投资和就业增长，迫使大量雇主投资国外，就业岗位流失，抑制经济发展。2008-2016 年期间，美国平均 GDP 增速 1.4%。工资增幅几乎停滞不前。2.6 万亿美元外汇收入滞留国外。许多产业的所有者将公司搬迁至其他国家，享受更现代且优惠的税收政策，造成了数万亿美元收入和数十万岗位流失。

TCJA 降低了各阶层个税税率。比原有减税标准还多一倍；同时为家庭提供了重要支持，使美国人民可持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同时也为各级雇主带来了税收优惠，这样他们就能在企业 and 雇员身上投入更多收入。具体而言，公司税率下调到 21%，减税大大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税务压力。同时，美国企业也更容易将境外收入转回本国，因此不再需要制定奖励机制，激励海外美企回国发展。

减负众望所归，就业不断增加，经济实现历史性增长。TCJA 兑现了承诺，减少了人民的税务压力，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创造了就业，推动了经济增长。80%的工人实现了收入增长；中等收入家庭成为减税的直接受益者，年总收入 7.3 万美元的四口之家年均少付 2000 美元的税；2018 年，时薪和工资增长了 3.1%，是近 10 年来最大的增幅；同年失业率降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最低值，仅为 3.9%，CBO 在 2019 年的失业率预计将持续下降至 3.5%；目前新增就业岗位达 730 万，创历史新高；2018 年第三季度 GDP 年增长率达 3.4%。

（摘自 Budget Digest: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Fix Broken Budget Process, republicans-budget.house.gov, 2019 年 2 月 25 日, 由文月编译）

税改与过渡时期

编者按：一年多来，美国企业和个人已基本接受这些涉及面广泛的税制改革措施，本文对一年来对纳税人产生影响的主要改革措施进行总结和评估。

背景：《减税与就业法》

《减税与就业法》（TCJA，第 115-97 号公法）最终版本由特朗普总统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签发成为法律。《减税与就业法》覆盖面广泛，对美国税制几乎无所不涉，它关乎个人、企业、国际税收，以及税法的诸多其他领域。就企业而言，其中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从边际税率高达 35% 的税率调整为 21% 的统一税率，使美国所得税更符合全球平均税率水平。此外，《减税与就业法》还引入了准属地企业所得税制度，即对国内企业拥有海外子公司 10% 以上股权的子公司，分回国内企业的海外股息红利所得全额免税。另外，对美国企业在海外累积利润，引入了“视同汇回税”（亦称“过渡税”）。

值得注意的是，《减税与就业法》还引入了一些全新税收理念，以防止企业利润流向那些低税收国家或地区，鼓励美国企业将利润保留并投资在美国境内。其中包括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机制，海外衍生性无形资产收入（FDII）机制，以及反税基侵蚀税（BEAT）规定等。为了帮助纳税人能自觉遵从这些新的规定，财政部和国税局（IRS）发布了大量的指南和细则。这些新规均已在 2018 年逐步分别公布。

一、关于 BEAT

BEAT 是《减税与就业法》通过修订税法典第 59A 条新增的规定，它是税改案中较为出人意料的条款之一。BEAT 属于一种最低限额税，目的是为了对那些向海外子公司汇出可税前抵扣的资金，以大幅降低美国境内应税税基的企业施以惩罚性税收。BEAT 的计算方式为：将企业向其海外关联企业所支付的资金加回到税前所得内，以该调整后应税所得乘以 BEAT 税率，然后减去企业正常应纳税额，得到最低限应纳税额，2018 年 BEAT 税率为 5%，2019 年调增至 10%，从 2025 年起，将升至 12.5%。BEAT 条款主要针对那些三年平均毛收入超过 5 亿美元，且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可税前扣除款项的美国企业。

2018 年 12 月 13 日，国税局（IRS）发布了 BEAT 建议操作细则。细则就以下具体问题提供了详细指南：哪些纳税人应适用第 59A 条规定；如何确定哪些款项支付属于税基侵蚀性支付；如何计算税基侵蚀最低限额税；以及如何据此得出应纳的税基侵蚀和反滥用税额。

二、关于 GILTI 和 FDII

另外一项全新的、出人意料的改革就是 GILTI 机制。税法典第 951 条及相关条款中关于 GILTI 的规定，旨在防止美国公司将高收益无形资产向低税国家或地区转移。GILTI 的课征对象是美国母公司所拥有的外国受控公司超过 10% 常规收益水平的那部分所得。GILTI 也可享受 50% 的一般扣除额，经扣除后其实际有效税率为 10.5%。

此外，与 GILTI 配套的海外衍生性无形资产收入（FDII）机制，则是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将知识产权保留在美国境内，它为超过 10% 常规收益部分的所得提供了 37.5% 的特别扣除，使 GILTI 的实际有效税率降至 13.125%。

2018年9月13日，IRS发布了关于GILTI机制的建议操作细则。细则明确：GILTI适用于受控外国公司（CFC）于2017年12月31日后的首个纳税年度，其美国母公司在受控外国公司相应纳税年度内终止的纳税年度，以及其后各纳税年度。细则还明确了新的报告义务，即纳税人需填写并提交“后的首个表格”——《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美国母公司计算表》来完成GILTI申报。不过，关于与GILTI有关的境外税额抵扣的计算规定，细则并未具体说明，留待后续进一步规定明确。

三、关于过渡税

税改前，海外公司的利润一直要到作为股息红利或以其他方式分配或汇回给美国股东时才对其征税。而根据新的第965(a)条税法规定，此类累积海外利润需缴纳“过渡税”，这是从全球所得管理体系向属地管理体系转变的具体体现之一，即对那些累积在海外的利润实施税收管控。当然，最近汇回的利润可以享受特惠税率。

“过渡税”的课征原理是将美国公司境外子公司的海外利润视同汇回。所涉海外利润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适用15.5%税率，其他利润适用8%的税率。“过渡税”可在8年内分期缴纳。“过渡税”属于较为复杂的税改项目之一，关于“过渡税”的建议操作细则是由财政部和IRS于2018年8月1日发布的，长达249页。细则详细解读了税法第965(a)条所规定的海外利润的计算和报告，以及按照第965条之规定纳税人可以做出的具体选择。IRS说，可以通过税法典第965(c)条所规定的“参与扣除”来降低第965条所述之利润的实际有效税率。第965(g)条所列项目还可以适用下调境外税额抵扣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利息支出扣除

旨在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另外一项改革是针对企业利息支出扣除。在2017年12月31日之后的纳税年度，企业的营业利息扣除限额为调整后的应税所得加折旧摊销后的总额的30%。上述利息扣除限额不适用于之前3个纳税年度内年均毛收入不超过2500万美元的纳税人，且从2019年起按年随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有些行业不受该限额限制，包括受雇表演行业、房地产交易行业、农业和某些行政公用事业。纳税人必须选择按房地产交易行业还是按农业等豁免上述扣除限额。

2018年11月26日IRS发布了关于企业利息扣除限额政策改革的细则。细则规定，纳税人需使用新的“发布。详细表格”——《税法第163(j)条企业利息支出扣除限制表》来计算并报告其当年利息税前扣除情况，以及不予扣除部分拟结转至下一纳税年度扣除的具体情况。

五、关于折旧扣除

除了旨在防止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利润的新规外，《减税与就业法》也提供了若干“胡萝卜”政策以鼓励在美投资的。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100%折旧扣除。该政策通常适用于恢复期不超过20年的折旧性资产和某些其他类财产。机械、设备、电脑、器具和家具等一般都符合条件。上述折旧扣除可以追溯适用于2017年9月27日之后取得并使用的符合条件的资产。

2018年8月8日《联邦政府公报》(Federal Register)公布了100%折旧扣除的建议细则。细则提供了关于哪些财产可以进行扣除，以及关于符合条件的影视作品、戏剧作品和某些设

备的具体规定。

六、关于“穿透”扣除

为了减少个人经营者的税收负担，税法第 199A 条增加了关于符合条件的经营所得可以加计 20% 扣除的规定。该扣除适用于个人独资、个人合伙、S 类公司和某些房地产信托机构的经营所得。纳税人可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的纳税年度采用该项扣除。工薪所得不适用“穿透”扣除，C 类公司的经营所得（按企业所得税税法征税）不适用“穿透”扣除。与《减税与就业法》推行的大部分个人所得税扣除改革政策一样，“穿透”扣除也属于当前税法下的临时性安排，将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2018 年 8 月 8 日，IRS 发布了“穿透”扣除政策的细则。细则中包含税法第 643 条规定的一项反避税条款，即在某些情形下将多个信托项目视为一个信托项目的相关条款。

展望

上述内容只是对取得境内和境外所得的企业的税务处理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多改革措施的冰山一角。本次税改规模宏大，广大纳税人在按照新税法计算应纳税款时，都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遵从障碍。最近发布的多个建议细则都还没有最终定稿，贯彻落实《减税与就业法》的相关改革措施仍将是 2019 年 IRS 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的细则和解读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出台。而且，11 月中期选举改变了国会政治格局。目前，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可以预见，他们会在 2019 年推进自己的税收议程。这是否会对美国税法产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摘自 Analysis & Commentary: Tax Reform in Transition, *globaldaily.com*, 2019 年 1 月 11 日，由谢宗炜编译）

财政部关于第 163 (j) 条款的拟议规则

一、概述

2018 年 11 月 26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拟议条例，规范第 163 (j) 条利息费用限额规则。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TCJA) 修订了第 163 (j) 条，将净业务利息支出的扣除额限定为公司“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ATI) 的 30%。在发布拟议条例之前，美国国税局发布了 2018 (28) 号通知，对第 163 (j) 条规则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初步指引，包括其对联合集团的适用问题以及根据旧 163 (j) 条结转纳税人不被允许的不合格利息。但 2018 (28) 号通知还是给纳税人适用新的第 163 (j) 条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拟议条例提供了与确定利息费用限额的机制相关的必要指导，还明确了第 163 (j) 条对联合集团、RIC、REIT、合伙企业、受控外国公司 (CFC) 和其他形式的外国公司的适用问题。但是，拟议条例并未包括根据第 59A 条协调新的第 163(j) 条与税基侵蚀和反避税 (BEAT) 条款的规则。相反，拟议条例保留了这两个规则的交互部分，因为这些问题将在第 59A 条的独立指南中予以考虑。此外，该拟议条例废除了旧的第 163 (j) 条下的 1991 年的拟议条例。

与拟议条例同步，2018 年 11 月 26 日，美国国税局也发布了税收程序 2018-59(Rev. Proc.2018-59)，设定了安全港规则，允许纳税人仅为具备第 163 (j) (7) (b) 条规定的房地

产交易或业务的资格而将某些基础设施项目视为房地产交易或业务。该条例建议在以最终形式在联邦公报中公布后的纳税年度生效。但是，条例规定，如果满足某些条件，纳税人可以选择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开始的纳税年度适用拟议条例。

2018 年 12 月 6 日，普华永道在“税改准备的网络直播：对第 163 (j) 条拟议条例的实际反应”中报道了该拟议条例。

二、背景详述

原第 163 (j) 条：一般而言，根据旧的第 163 (j) 条，纳税人支付或应计给不缴纳美国税的某一关联方（如某一外国关联方，其预提所得税根据所得税税收协议被豁免）的特定利息的净利息费用扣除额仅限于纳税人 ATI 的 50%——大致相当于息税折旧和摊销前利润（EBITDA）。支付或应计给非关联方在关联方担保贷款中的利息也适用相同的处理规则。先前的法律包含一个安全港规则，即如果纳税人的债资比为 1.5: 1 或更低，则不适用该限制。不被允许的扣除额可以无限期结转，纳税人的超额限额可以结转三年。

（摘自 PwC's Insights, Treasury Issues Proposed Rules Under Section 163(j), *intellicnect.cch.com*, 2018 年 12 月 12 日，由林铃编译）

财政部关于外国税收抵免的拟议规则

一、概述

2018 年 11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根据第 78、861、901、904、954、960 和 965 条规则发布了拟议条例，是继 2017 年税改法案颁布之后，第一份关于**外国税收抵免（FTC）制度**的行政指引。拟议条例是关于，税改法案通过废除第 902 条下的间接抵免、修改第 960 条下的视同已付抵免以及在第 904 条下引入两个新的外国税收抵免限制篮子，对美国企业纳税人外国税收抵免的限制。

拟议条例对以下事项提供了必要的指引：根据第 904 条确定外国税收抵免限额的机制，包括费用的分配和摊派；新的外国分支机构篮子的范围；以及与受控外国公司 F 分部和取得全球隐性低税收入（GILTI）的实体有关的视同已付外国税收抵免的范围。

拟议条例确认了对特定外国子公司额外征收美国税的可能性，通过将费用分摊到取得 GILTI 的实体，这些外国子公司在缴纳外国税时适用高税率；为分类和跟踪外国子公司的资本和收益设定复杂的规则；并限制税改法案下收到股息的抵扣和 FTC 的适用性。拟议条例不包括有关 FTC 与税改法案的税基侵蚀和反滥用税（BEAT）交叉的规则，也不包括来自 GILTI 实体的收益和基准调整的完整处理规则。

2018 年 12 月 14 日，美国国税局发布了第 2019-01 号通知，其中概述了即将到来的预先征税 E&P 账户（PTEP），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拟议条例。此外，普华永道全球结构税专家于 12 月 12 日在普华永道税收改革准备系列的网络直播中讨论了拟议的 FTC 规则。

二、背景详述

为了缓解先由外国政府征税的外国收入的双重征税问题，美国企业纳税人通常可以就这

些收入缴纳的外国税申请税收抵免。在《减税与就业法》颁布之前，美国企业纳税人通常可以根据第 902 条的规定，对特定外国子公司缴纳的外国税进行间接税收抵免，而第 960 条规定允许对与受控外国公司 F 分部收入相关的外国税进行视同已付抵免。

《减税与就业法》引入了新的第 245A 条规则，该条款允许国内公司抵扣来源于国外的股息，而无需外国子公司支付的任何外国税。考虑到第 245A 条缓解了当国内公司收到来源于国外的股息时的双重征税问题，税改法案废除了第 902 条。

虽然税改法案在通常情况下允许美国企业纳税人继续对其受控外国公司 F 分部的收入申请视同已付 FTC，但它修改了第 960 条，使之仅适用于外国税“准确归因于”该受控外国公司 F 分部实体的情况。在这一变化之后，国内公司可以继续申请视同已付 FTC，但仅限于本年度受控外国公司 F 分部的收入产生的外国税部分，即基于《减税与就业法》，第 960 条下的合并计税法不再适用。

根据第 904 条，美国企业纳税人可获得的 FTC 一般仅限于来源于国外的应税收入缴纳的外国税。税改法案将利息支出的分配标准从资产的公允价值法修改为资产的调整后的计税基础法，即利息支出的分配现在基于资产的调整后的计税基础。

税改法案通过引入两个新的针对外国分支机构收入的限制篮子和第 951a 条下的新 GILTI 条款，进一步将 FTC 限额的计算复杂化。重要的是，一个美国股东被认为只需支付一家外国公司为其收入支付的外国税款的 80%，而这些收入最终会成为股东 GILTI 收入的一部分。此外，依据第 904 条被限制的 FTC 可以延期一年，并向后结转 10 年，但《减税与就业法》否认了因 GILTI 产生的外国税的结转条款。

三、评论

在新 FTC 制度与 GILTI 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减税与就业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存在费用是否以限制 FTC 为目的，在美国股东层面分摊给 GILTI 篮子收入的问题。如果将利息、研究和实验 (R&E) 以及管理费用等美国股东层面的费用，分摊到 GILTI 篮子以减少 GILTI 的 FTC 限额，美国股东可能需就 GILTI 缴纳美国税。进一步地，尽管税改法案设立了 GILTI 篮子，它尚未指明第 78 条的“总计”是包含在 GILTI 篮子内还是在第 904 (d) 条规定的另一个 FTC 限制篮子中。此外，税改法案未规定从一般限制篮子中结转超额 FTC 的具体规则。

拟议条例受到高度期待，因为需要一个总体指引明确新制度的一些计算问题。

(摘自 PwC's Insights, Treasury Issues Proposed Rules Related to Foreign Tax Credits, www.pwc.com, 2018 年 12 月 14 日，由林铃编译)

IRS 发布 FDII 和 GILTI 扣除条例草案

2019 年 3 月 5 日，美国国税局根据《国内收入法典》第 250 条发布了条例草案，为国内企业对从国外获得无形收入(FDII)和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的扣除进行了规定。

草案就第 250 条下可扣除额的计算及 FDII 的厘定提供指引。此外，它还明确了合并报表上 FDII 的计算规则。2018 年 10 月 10 日的《联邦公报》明确了 GILTI 的计算办法。草案

还规定了新的报告规则，要求提交与第 250 条下 FDII 及 GILTI 扣除相关的表格 8993。《减税与就业法》将明确 GILTI 管理的第 250 条和第 951A 条加入了《国内收入法典》。

GILTI 规则旨在阻止美国企业将知识产权等高收益无形资产转移到低税率的司法管辖区。 GILTI 的定义是，美国股东拥有的一家受控外国公司所得中超过 10% 的名义回报率的部分，该名义回报率旨在反映有形资产的正常回报水平。扣除 50% 后，GILTI 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0.5%。

FDII 旨在配合 GILTI 相关政策的实施，通过对回报率超过 10% 的部分给与 37.5% 的扣除从而将有效税率降至 13.125% 的方式，鼓励美国公司在美国持有知识产权。美国国税局目前正在征求公众对该条例草案的意见和建议。提交期限是在《联邦公报》公布后的 60 天内。

（摘自 IRS Issues Proposed Regs On FDII and GILTI Deductions, *researchhelp.cch.com*, 2019 年 3 月 7 日，由沈淼编译）

高税率导致退休提前

编者按：最新研究表明，税率会影响低收入者和女性的退休决策，妻子（或收入较低的配偶）比丈夫（或收入较高的配偶）更有可能因税收改革带来的高税率而选择退休。

试想，某接近退休年龄的丈夫或妻子，如果税率提高了，他们会怎么做？麦克利兰（Robert McClelland）和国税局凯文·皮尔斯（Kevin Pierce）及税收政策中心同事约翰·伊塞林（John Iselin）、菲利普·史泰尔沃思（Philip Stallworth）发表了新成果，发现妻子（或收入较低的配偶）比丈夫（或收入较高的配偶）更有可能因税收改革而选择退休。但仅限于特定情形：妻子和收入较低的配偶对高税率的反应更强烈，并在他们的配偶已经退休的情况下退休。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1999 年至 2010 年间已婚夫妇提交的一组匿名纳税申报表，这些已婚夫妇至少有一方年龄在 50 岁或以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年份里，这种反应都很小：根据我们估计，有效税率提高 10%，妻子（或收入较低的配偶）退休的可能性会增加 2%，相比之下，丈夫和终生收入较高的配偶似乎都不会对同等水平的增税作出反应。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妮可·迈斯塔斯（Nicole Maestas）最近表示，尽管女性继续工作的年龄比以前大了，但妻子的退休年龄通常比丈夫要小。尽管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而且已婚女性在额外工作年限里的报酬比已婚男性更高，但她们还是会这么做。她们更早退休的一个原因在于，女性都倾向于嫁给比她们年长的男性，而夫妻通常同时退休。

但由于妻子的收入历来低于丈夫，我们猜测，她们更早退休还可能受到其中一个税法规定的影响：税率是由夫妻双方的总收入决定的，因此一方的税率取决于其配偶的收入。像我们这样的累进税制中，这可能导致收入较低的一方实际上同时面临着更高的边际税率和更高的平均税率，从而导致收入较低的一方退出劳动力市场。

以 2010 年的一对已婚夫妇为例，收入较高的一方工资为 35000 美元，收入较低的一方潜在工资为 10000 美元。假设这对夫妇申请了两项个人减免，适用标准扣除，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税收扣除或抵免。2010 年，他们大部分的收入免税，剩余部分需缴纳 15% 的联

邦所得税。如果收入较低的一方决定也工作，那么所有额外收入都将以 15% 的固定税率纳税（下图说明了这个例子）。收入较高的一方的平均所得税税率为 1.4%，收入较低的一方的平均所得税税率为 15%。

按照惯例，研究税收对工作决策的影响应分别考察丈夫和妻子的反应。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收入增加了，女性是婚姻中收入较高的一方的情况占到了三分之一。由于税法是引致收入较低的一方退休，而非妻子，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税收会如何影响他们的退休决定，而不是关注其对妻子的影响。我们在研究中考虑了收入较低的一方在特定年份的反应，同时也考虑了其长期反应。

我们发现税收确实会影响退休决策，但不是以我们设想的方式。当夫妻双方都工作时，税率似乎不会影响退休决策。一旦一对夫妇中的主要收入方退休，更高的税率会引致另一方也退休。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迈斯塔斯（Maestas）一致，但我们发现税收会助推提前退休。此外，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妻子，终生收入较低的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希望未来关于税收和劳动力供给决策的研究能更多地关注夫妻双方的相对收入，而不再仅仅根据性别来衡量其影响。

（摘自 Robert McClelland, Tax Increases Encourage Lower Earners and Wives To Retire Early, www.taxpolicycenter.org, 2019 年 2 月 21 日，由林铃编译）

关税影响作物保险

编者按：2019 年种植季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对农产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在种植前生效的第一个种植季。这些关税的影响已经对商品价格和市场施加了近一年的压力，现在已经在 2019 年作物种植季的作物保险价格中体现出来。

每年在种植季节开始之前，美国农业部风险管理局会根据预期商品价格和市场风险重新调整作物保险费。将价格和波动性，即与作物价格相关的风险水平的市场预期同历史产量相结合，来确定作物年度内可获得的收入保护水平和溢价成本。

春季作物中保险价格下降最为显著的是大豆。风险管理局的作物保险价格发现工具显示，在 2019 作物年度，春大豆的作物保险价格为 9.54 美元/蒲式耳，比 2018 年下降了 62 美分，是 2009 年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点。低作物保险价格是大豆出口中国的放缓和预期大豆存量将创历史新高的直接结果。大豆的春季价格反映了当前的贸易环境和需求放缓，如果美中就恢复中国大豆和棉花市场达成协议，大豆和棉花收成价格的提高将有助于在种植户遭受作物减产时，提高作物保险保护。

棉花的春季作物保险价格为 74 美分/磅，比 2018 年下降了 2 美分。尽管对棉花也征收了报复性关税，但由于全球存量大幅减少、美国出口强劲以及 2018 年的高废弃率，近年来棉花价格一直保持稳定。由于国内和出口渠道对玉米的强劲需求有助于减少国内库存，玉米的春季作物保险价格为 4.00 美元/蒲式耳，比 2018 年上涨了 4 美分，这是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春季价格。

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保险价格以及收益担保，是对一个月的价格发现期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和大豆）和美国洲际交易所（棉花）期货合约结算价格进行平均得到的。玉米、棉花和大豆的春季价格是通过对一个月的 2 月价格发现期内，新作物期货合约结算价格（玉

米 12 月、大豆 11 月和棉花 12 月) 进行平均来确定的。

一、预期价格分布

在 2019 作物年, 公布的玉米的隐含波动系数是 0.15, 与 2018 年的水平一致, 与 2017 年的 0.19 相比有所下降。基于 4.00 美元/蒲式耳的预计价格和波动系数, 假设呈对数正态分布, 玉米的新作物合约将在 3.62 美元/蒲式耳到 4.34 美元/蒲式耳到期的概率为 50%。(如果使用同期的期货价格、隐含波动率和到期日, 这些概率将有所不同。) 公布的棉花的波动系数为 0.14, 与上年持平。基于每磅 74 美分的预计价格, 假设呈对数正态分布, 棉花的新作物合约将以每磅 66 美分到 80 美分的价格到期的概率为 50%。公布的大豆的波动系数为 0.12, 低于 2018 年的 0.14, 是自 2016 年以来的最低隐含波动率。基于 9.54 美元/蒲式耳的预计价格和隐含波动系数, 假设呈对数正态分布, 大豆的新作物合约将以 8.87 美元/蒲式耳至 10.16 美元的价格到期的概率为 50%。

二、收成价格期权

在春季价格发现期之后, 农民可以购买收入保障保险, 为价格下降、作物减产或两者结合所带来的作物收入下降提供保险。如果收入下降或作物减产, 购买收成价格期权保险的农民将从春季种植价格或收获期间价格较高者处获得补偿。收成价格会在 10 月价格发现期后公布。

目前, 玉米、大豆和棉花的新作物价格均低于春季预期价格。3 月 1 日, 玉米的新作物期货结算价格为 3.94 美元/蒲式耳, 大豆为 9.46 美元/蒲式耳, 棉花为 73.8 美分/磅。在过去的六年里, 玉米的收成价格低于春季价格平均 60 美分/蒲式耳, 这意味着在收获期价格平均下降了 14%。在过去的五年中有四年, 大豆的收成价格低于春季价格, 平均下降了 11%, 即 1.14 美元/蒲式耳。2018 年, 大豆收成价格比春季价格低了 1.56 美元/蒲式耳。棉花的收成价格在过去五年中有四年低于春季价格, 平均下降了 7%。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情况下, 在生长期作物保险价格的下降与良好的高于趋势水平的美国平均作物产量是一致的。

三、种植面积

发现春季价格对农作物保险政策很重要。而且许多贸易商也用春季价格来评估未来作物年度, 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的潜在变化。美国农业部目前预计 2019 年玉米种植面积为 9200 万英亩, 比 2018 年增长 3.3%; 预计 2019 年大豆种植面积为 8500 万英亩, 比 2018 年下降 4.7%。大豆 2019 年 8500 万英亩的预计种植面积是根据大豆与玉米的春季价格比 2.39 估计得到的, 这一比率高于近 10 年和近 20 年的平均值。

下次评估潜在作物种植面积是 3 月 29 日的种植面积前景报告。根据 3 月前两周的调查结果, 种植面积前景报告将对下一个种植年度, 预计的行列作物的种植面积进行首次估计。本报告将消除潜在种植面积决策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重要的是, 它还将揭示种植者通过在 2019 年减少大豆种植, 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

(摘自 John Newton, Tariffs Impact Crop Insurance Coverage in 2019, www.fb.org, 2019 年 3 月 4 日, 由林铃编译)

就业、减贫与税收抵免关系说

编者按：民主党正在提出旨在减轻美国工薪阶层压力的方案。他们主张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适用的税收抵免进行扩大或补充。这些税收抵免政策有三个目标：减少贫困、扶助儿童、刺激就业。不过，最近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伊莎贝尔·索希尔（*Sabelle Sawhill*）和克里斯托弗·普利亚姆（*Christopher Pulliam*）分析表明，这三项目标并非始终能保持一致，他们敦促政策制定者要意识到这其中需要权衡之处。他们认为，议员在新增或扩大税收抵免时，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份分析报告比较了四种方案下的收益和成本：两个由民主党派提出的方案，一个由我提出的可全额退还税款的儿童税收抵免方案，还有一个由 Belle 提出的旨在帮助新就业者的税收抵免。结果发现，四种方案下的收益和成本存在显著差异。

所得税抵免（EITC）每年约为 16% 的美国家庭提供约 700 亿美元福利。几乎 40% 的有孩家庭都享受了所得税抵免，所得税抵免的服务对象几乎也全都是这类有孩家庭；另外，收入极低的无监护权父母和无孩劳动者也享受了一小部分所得税抵免。至于儿童税收抵免（CTC），则是每年为全美 29% 的家庭和 90% 的有孩家庭带来 1200 亿美元的福利。以上两项税收抵免每年能使 83 万人（包括 45 万儿童）摆脱贫困。

一些议员提出对就业人口和家庭进行进行额外补助以对现有抵免政策进行补充。例如，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提出的家庭宜居收入（LIFT）中产阶级法案就是对现有所得税抵免的一项补充，它能为许多就业者提供新的抵免——单身就业者最多能获得 3000 美元的补助，已婚就业者最多能获得 6000 美元的补助。

还有人则主张新增一些税收抵免：例如，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和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提出了一个名叫“为美国人增加收入”（GAIN）的法案，根据这项提案的内容，无孩就业者每年将获得约 3000 美元的所得税抵免（比现有法律规定的抵免额高出 500 美元），而有孩就业者获得的所得税抵免几乎翻倍（根据孩子数量的不同，目前抵免额从 3500 美元至 6400 美元不等）

索希尔和普利亚姆总结认为，以上两个提案都能通过为就业者——尤其是那些因为没有孩子所以目前只能享受很少或不能享受抵免的就业者们提供持续性的扶助来促进就业。但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们同样分析了这些提案对较低收入者的影响，也研究了税制体系怎样实现对儿童的帮扶效果达到最优。基于个体收入水平设计的税收抵免能够最直接地帮助到收入较低的群体。但是这类税收抵免所带来福利的指向性可能较弱，它更多地扶助了总体收入较高但某一家庭成员收入却很低的家庭。而增加儿童税收抵免的提案则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它能够最有效地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儿童。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提案的未来如何，取决于哪个目标最终抓住了选民和议员们的想象——是减少贫困、为儿童谋福利、还是促进就业。但索希尔和普利亚姆提醒我们，一旦国会设定好目标，政策制定者就应当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并制定出能够最有效达成目标的政策。

（摘自 Elaine Maag, *How To Choose Among Tax Credits That Aim To Support Work, Children, And Poverty Reduction*, *www.taxpolicycenter.org*, 2019 年 1 月 28 日，由文月编译）

世界经济数字化的税收原则

编者按：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各国开始围绕迅速数字化世界经济，讨论制定税收提案，但对于“数字业务”征税的影响，各方看法不一。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开始围绕迅速数字化的世界经济讨论制定税收提案。2019年1月，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高级成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就这个问题致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他们敦促政府明确反对单方面征收数字服务税。最近在巴黎，姆努钦（Mnuchin）部长清晰有力地传达了这一信息。现在的情况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的报道，3月6日，法国内阁开始考虑对“数字业务”的收入征收3%的税。

对“数字业务”征税的单边行动会适得其反。显然，互联网使跨境提供数字服务变得越来越实用和经济，关于改革国际税收制度以适应全球经济数字化的对话是有意义的。为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在采取一项重要的行动，这应该是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行动中的重心。单边行动是与OECD成员国努力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会威胁到包括贸易在内的全球经济利益、损害国际信任、破坏国际协议的前景。国别化的机制会形成分化，从而同时增加纳税人和税务管理者的负担。

OECD和其他组织为应对各种规模和各个行业的企业所面临的数字化挑战，正在不断努力制定各种解决方案，作为美国商界代表的美国商会认为，这些行动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方案重点应放在通过违规操作避税和侵蚀税基的具体问题上。

二、税收立法应确保行业中性，避免针对特定行业的特殊税收优惠或惩罚。促进增长的税收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由市场而非税制配置资本和资源。必须严格遵循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

三、直接税应该对净利润而非收入征收。对收入征税忽略了与销售相关的成本，也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四、包括OECD倡议在内的所有与税收有关的立法，都应提供简单、可预测和易于理解的税收规则，以提高合规性并降低税收管理成本。这些政策应通过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确定性，包括强制有约束力的仲裁以及对企业和政府都适用的恰当的安全港规则。

五、税法的任何调整都应配合切合实际的过渡规则，以便为政策落地提供足够的时间，并帮助减少企业在税制转变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

六、所有缔约方都必须遵守其国际承诺，包括防止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义务以及贸易协定中的非歧视和国民待遇义务。为避免双重征税，国际税收规则的调整必须伴随着税收和贸易协定的变化。

法国并不是唯一采取单边行动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英国和智利都正在考虑采取类似措施。我们敦促他们摒弃看似容易攫取收入的道路，转而集中精力达成OECD范围内的共识。税收政策和数字商务问题本身都很复杂。必须通过多边行动以公平、均衡、透明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

加州拟征收数据税

编者按: 互联网公司利用大量的公民数据信息获利颇多, 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 并着手酝酿针对互联网公司征收的“数据税”, 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越来越多的加州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通信获得了数十亿计的收入, 这使得新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提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 为什么不补偿消费者提供了使互联网公司获利的数据呢? 2月, 纽森州长宣布了引入所谓的“数据分红”计划, 他宣称这是一种让消费者“分享他们的数据创造财富”的方式, 科技公司通过“收集、整理和货币化”用户信息赚了数十亿美元。

数据税细节尚未确定, 但据报道, 州长办公室注意到了其他地方讨论的关于对靠数据获利的公司进行征税的提议, 并成立了一个团队来设计分红。他们应该记住, 尽管数据税是一个好的出发点, 但它不足以矫正渗透在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失衡, 它的实施必须附有加强对个人的代理的措施。

消费者因向公司提供数据而应得到补偿并非新观点。“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2013年首次提出之后, 学术界和倡议团体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法律学者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和经济学家格伦·韦尔(Eric Posner)认为普通公民日常向大公司提供有关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信息, 而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互联网公司反驳说, 他们免费提供广受欢迎的服务, 为消费者和整个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提供用户感兴趣的内容, 提高了他们在商业和私人活动中的效率。此外, 至少有部分人觉得, 用个人信息换取了因获得关注而得到的心理安慰。

但这些论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大多数消费者对互联网公司从他们那里收集了多少数据以及如何将数据货币化一无所知。一旦了解到更多, 一些人会调整他们的行为, 即使存在机会成本, 他们也会彻底离开这些互联网平台, 或者不再点击广告和购买推广的产品。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有针对性的广告是如何通过只向特定群体展示就业和住房机会来实现种族歧视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 从不同地点浏览同一商品的购物者可能会因其周边居民的富裕程度而看到不同的价格。

想要每个人在放弃自己的隐私以换取平台服务时, 都做出知情选择, 这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在因网络效应而趋向垄断的市场中。正如德国反垄断局所言, 平台用户可能只是想继续享受某些特定类别的服务, 别无他法, 而使自己陷于大量数据收集。信息不对称加上有限竞争导致了强烈的市场失灵。此时, 公共干预是正当的。

2017年, 欧盟委员会试图对“用户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活动”中产生的企业所得征收3%的税收。由于在欧盟层面上没有找到任何规定, 一些欧洲国家计划自行开征数据税。在美国也有先例: 华盛顿州议员提议对数据销售收入征收3.3%的税。在概念上, 这些政策与对通过电商渠道取得的销售商品和服务的收入征税不同, 它们旨在获取由用户数据自身的可用性产生的收入。

对于寻求向消费者提供数据补偿的政府而言，征税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数字经济中增加值的衡量还存在很多挑战，但征税是容易的。它不需要直接评估每条信息的价值，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谁应该纳税，数据驱动的活动怎么界定，一旦这些关键选择做好了，执行和监控是简单直接的。

决策者不应低估收入分配带来的挑战。“分红”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货币支付，但通过直接支付给消费者进行再分配不是很好的选择。一项粗略的计算表明，对主要技术公司的国内收入征收 3% 的税，2018 年每位美国居民将获得约 32 美元的收入，大致相当于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0.1%，这笔款项对绝大多数受益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并不能准确反映用户数据在数字创新中发挥的作用。

货币价值不是唯一的问题。无论多大金额的转移支付都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个人数据代理机构有限以及普遍存在的隐私风险等问题。数据税的收入应直接用于解决这些问题。归集每个居民的 32 美元，对于加州而言是 13 亿美元，范围扩大至全国，将会变成 100 亿美元以上。这笔钱应用于支持以下三方面的努力：

一、发展科技，使消费者更加了解他们为企业提供的信息及其用途。隐私政策中，用复杂法律语言编写的冗长的解释，难以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可通过可视化地跟踪与谁共享了什么，并为用户提供一种直观方式来限制他们数据的流通，这样一款应用程序必将做得更好。

二、监管数据市场的试验。目前，微观信息的私人市场不发达，具有剥削性和危险性。相较于企业，消费者没有议价能力，因此单独出售数据的尝试只能带来微薄的回报。犯罪分子和间谍可以伪装成合法买家收集敏感信息。正如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所言，没有约束的“购买隐私”的模式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数据市场有可能为个人赋权，但他们需要集体谈判、对可出售的数据信息设限的相关规定以及透明的定价机制。区块链社区在技术市场架构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但监管的部分是缺失的。

三、从数据中提取经济价值并可以保护隐私的方法研究，例如合成数据集的生成以及用于统计分析的差别个体算法。面对许多国家日益严格的隐私立法，对违规行为的巨额罚款，技术公司是有动力避免侵犯性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如果同样可以获利的替代方案能够被广泛获取并采用，消费者的压力也会降低。

（摘自 Claudia Biancotti, Should Internet Companies Be Taxed for Profiting from Private Data, *piie.com*, 2019 年 3 月 1 日，由林铃编译）



《财经数据》

二月份就业报告乏善可陈，但经济仍保持强劲

编者按：美国劳工局二月就业报告虽然显示就业市场新增岗位数量低于预期，但其他就业指标均显示美国经济在健康发展。

二月的就业报告低于预期，但是大多数指标显示经济仍健康发展。星期五，劳工统计

局报告称二月新增 20000 个就业岗位，远低于专家之前预测的新增 180000 个就业岗位。尽管新增就业数本可以更高，这份报告反映了就业市场整体上是强劲的。连续 101 个月有新增就业岗位，美国人的工资也在稳步提升。

和过去相比，更多的美国人找到了工作。报告显示：失业率从 1 月份的 4% 下降至二月份的 3.8%，劳动力参与率基本上保持不变。并且，用来衡量急于寻找工作的和因为经济原因从事临时工作的 U-6 失业人数比率，从 8.1% 降至 7.3%，为近 5 个月的最低值。这表明希望找到工作的人可以轻易找到工作。并且，通过对 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1 月的就业数据进行修正，发现又增加了 12000 个就业岗位。

主要就业群体的失业率在 2 月进一步下降：成年男性的失业率为 3.5%，白人的失业率为 3.3%，拉美裔的失业率为 4.3%。成年女性、青年、亚裔的失业率（分别为 3.4%、13.4%、3.1%）在过去几个月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尽管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从一月份的 6.8% 上升至 2 月份的 7%，残障美国人的失业率却下降至 8%。进一步挖掘就业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专业服务和商业服务领域增加了 42000 个就业岗位，医疗健康领域增加了 21000 个就业岗位，零售业增加了 11000 个就业岗位，制造业增加了 4000 个就业岗位。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建筑业减少了 31000 个就业岗位，采矿业减少了 5000 个就业岗位。

报告揭示了工人工资的持续稳定增长：员工的平均时薪增长了 11 美分至 27.66 美元。在过去的一年，平均时薪增长了 3.4%，远超通货膨胀率，这预示着员工会认真考虑全美目前空缺的 730 万个就业岗位。

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关键取决于政府政策。全国的生产商、农民、企业主正在规划未来，如果存在不确定性的话，他们的规划将步履维艰。总统和国会在减税和放松管制方面是正确的，然而，推行新的关税将会阻碍经济回暖，并且，减税和监管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正被两党共同推动的、失去控制的联邦政府开支所吞噬。

就业报告是美国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之一。尽管二月份的新增就业岗位低于预期，但当前经济持续释放出信号，预示着我们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当前两党应该精诚合作并出台政策，从而确保二月的低就业增长只是暂时的。

（摘自 Timothy Doescher, February Jobs Report Underwhelms but Economy Remains Strong, www.dailysignal.com, 2019 年 3 月 8 日，由王阳逸编译）

二月份工资增速创 10 年来新高

编者按：美国劳工局发布的二月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工人薪酬水平提高、新增就业岗位较多、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率指标向好。

根据劳工统计局发布的二月就业情况报告，平均名义时薪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增长了 3.4% 长了创 2009 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并且工资同比增幅已连续 7 个月超过 3%。在 2018 年以前，从 2009 年 4 月开始的平均名义时薪增幅从未超过 3%。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也在增长。根据 2018 年 12 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过去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1.7%；根据 1 月份最新的消费价格指数，过去一年的通货

膨胀率为 1.5%（两个通胀指数均不包含 2019 年 2 月份的通胀数据）。

2 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为 20000 个，过去 12 个月平均每月新增 209000 个就业岗位，过去 6 个月平均每月新增 190000 个就业岗位。过去 12 个月和过去 6 个月的平均月新增就业数均高于 2017 年的月均数——每月新增 179000 个就业岗位。1 月份和 2018 年 12 月的就业人数也得到了修正并合计新增 12000 个就业岗位（2018 年 12 月新增 5000 个，1 月新增 7000 个）。大选以后已新增 530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制造业新增 49.3 万个就业岗位。

报告也强调了创历史低点的失业率，2 月份失业率降至 3.8%，仅仅略高于 2018 年 11 月创 50 年来最低记录的 3.7%。这预示着过去连续 12 个月失业率均低于 4%。除了失业率的整体下降以外，拉美裔的失业率也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4.3%，这是 1973 年以来的最低点。白人 3.3% 的失业率也接近 1969 年以来的最低值。

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率也是衡量劳动力市场强弱的关键指标：劳动力参与率用来衡量有多少人正在工作或是正在寻找工作；就业率用来追踪正在工作的人群占比。劳动力参与率创 2013 年以来最高值，在 2 月份保持在 63.2%。就业人群比率创 2008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值，保持在 60.7%。

尽管就业人数的增长低于预期值，但一个月还不足以形成趋势。并且，从报告整体来看——工资正在增长、失业率持续走低、就业岗位长期持续增加，都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可持续的增长和优势。

（摘自 February Jobs Report Shows Wage Growth is the Fastest Since 2009, www.whitehouse.gov, 2019 年 3 月 8 日，由王阳逸编译）

美国农业部预测 2019 年农业收入

一、美国农业部将于 2019 年 8 月更新预测

美国农业部 3 月 6 日发布了 2019 年农业收入和其他财务指标第一次预测数据。根据农业部的收入预测，2019 年，作为农业盈利能力衡量指标的农场收入净额预计将达到 694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 10%，即 63 亿美元。

尽管美国农产品面临着持续的报复性关税，但农场收入净额预计仍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趋势产量的预期以及部分商品价格略有上涨。随着实际种植面积、生长季节以及需求的相关信息逐渐明朗，这种早期预测还会再进行修正。2019 年农场收入净额预测包含了市场促进计划对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农民的直接支付。2018 年修正后的农场收入净额为 631 亿美元，是过去十年中的次低。美国农业部对 2019 年农场收入净额的第一次预测是 694 亿美元，这是过去十年来的第三低点。以 2019 年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2019 年的农场收入净额预计比上年增长 8%，增加 52 亿美元。即使是以通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2019 年的农场收入净额仍将处在有史以来最低的 25% 的区间内。

对农业收入增长的预期部分基于 2019 年总现金收入将增加 59 亿美元至 4280 亿美元。预计现金收入将增加的有玉米（+25 亿美元）、小麦（+5 亿美元）、大米（+2 亿美元）、棉花（+5 亿美元）、蔬菜和瓜类（+2 亿美元）、水果和坚果（+25 亿美元）、牛奶（+27 亿美元）、

牛和牛犊（+27 亿美元）以及肉鸡（+1 亿美元）。预计生猪（-7 亿美元）和大豆（-26 亿美元）的现金收入将下降，这两种商品严重受到了报复性关税的影响。

较高的生产费用部分抵消了较高的现金收入。2019 年的生产费用预计将增加 22 亿美元，达到 3720 亿美元。用工和利息费用在 2019 年预计都将增加，利息费用增加近 3%，达到 226 亿美元；用工费用增加 6.6%，达到 330 亿美元。

二、农场资产收益率

农场收入净额是衡量农业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另一个重要的财务比率是农场收入的资产收益率。农业资产收益率，即农业边际利润率，很好地体现了农场效率和盈利能力，并衡量了农业经营部门的资产收益率。2019 年，农场收入的资产回报率预计为 1.3%，略高于上年水平，但远低于 2013 年，且低于 10 年的平均水平 2%。事实上，一个相关的数据是，当前的农业经济衰退期的边际利润率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保持一致。

三、总结

美国农业部对 2019 年农场收入净额的第一次预测是 69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10%。当许多农场主在主要出口市场面临挑战时，农场收入净额预计仍将增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对许多商品较高的价格预期、作物趋势产量和较高的畜产品产量，以及对农民与贸易有关的直接支付。尽管预计农场收入的小幅增长将抬高农场的盈利能力，但 1.3% 的预计资产收益率还不到美国经济中其他权益工具和资产的收益率的一半。

虽然这些预测表明，对许多农民而言，2019 年可能会比 2018 年“更好”，但还有很多事情悬而未决。报复性关税仍在实施中，而且最近墨西哥和欧盟都威胁说，如果不取消针对钢铁和铝的 232 项关税，或者对汽车开征关税，他们也将加征关税。正如 2018 年的情况那样，加征的关税会进一步削弱我们在主要农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对农业收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完全恢复，那么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将增加，这可能会使价格和农业收入超出早期预测。供应冲击也会产生类似的价格和收入提升效应。

除了贸易不稳定外，在种植面积决策、生长季节以及对美国作物、牲畜、水果、蔬菜和其他园艺产品的需求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农业部将于 2019 年 8 月再次更新农业收入预测。

（摘自 John Newton, USDA's Early Look at 2019 Farm Income, www.fb.org, 2019 年 3 月 6 日，由林铃编译）

GIPC 知识产权指数有利于国际化

编者按：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技术创新、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立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利于企业国际化。

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它确保发明家、企业家因独创性而获得回报，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而且由于美国创新者在世界经济中无处不在，因此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大还不够，而其他经济体也必须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

这也是创设国际知识产权指数的原因之一。由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GIPC）设

计的该指数，对 50 个国家知识产权框架进行排名进行年度报告。指数是各国追求更大经济增长的路线图，也是影响全球知识产权政策的工具。

知识产权使研究、投资和风险承担成为企业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是知识经济的命脉，也是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我们能否为全球带来突破性的医疗、最新的创意内容和尖端技术，取决于外国政府能否通过强有力知识产权法，营造有利创新环境。但有些国家还迟迟未进行改革。这就是知识产权指数的作用。

2019 年指数对 50 国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了基准测试。50 个国家的 GDP 占全球 90% 以上。向各国展示了知识产权法对邻国和贸易伙伴的强大程度，并为其提供了变革动力。自 2012 年首次公布知识产权指数以来，多个国家政府已联系美国商会，讨论如何提高其指数分值。这些政府认识到，对其知识产权架构作简单调整，就能使吸引外国投资可能性增加 39%，吸引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可能性增加 30%。

我们通过指数排名推动海外盟友直接合作。我们致力于全国性立法、简化专利许可程序，强化版权保护，为成长型企业保护商业秘密。我们的行动成果包括：使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环境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具体政策，为所有人带来更多投资、创新和繁荣。

几个国家的排名已经有所上升。这得益于与商会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的直接合作，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国家与我们合作。这些改进不仅有利于各国加强本国经济；而且还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强大的全球经济，以驱动创新并改善我们的生活。

（摘自 Thomas J. Donohue, Global IP Protections Boost Businesses Everywhere, www.uschamber.com, 2019 年 3 月 4 日，由余菁编译）

美国政府 2019 年 2 月预算回顾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CBO），**联邦政府 2019 财年前五个月的预算赤字为 5370 亿美元**，同比增加 1460 亿美元赤字，财政收入与 2018 财年前五个月相比减少了 40 亿美元，而支出则增加 1420 亿美元。

然而，上个财年前五个月的支出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有部分支出从 2017 年 10 月（2018 财年）转移到了 2017 年 9 月（2017 财年）。发生这种支付转移是因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这个 2018 财年的第一天正好落在了周末。如果去除这些变动的的影响，上年财年前五个月的赤字将增加 440 亿美元，而本财年至今的赤字将是 1020 亿美元而非 1460 亿美元。

表 1 2018 年 10~2019 年 2 月预算总额

单位：10 亿美元	2018 财年（实际）	2019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
财政收入	1286	1282	-4
财政支出	1677	1819	142
赤字（-）	-391	-537	-146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根据 2019 年 1 月《财政部月报》以及 2019 年 2 月《财政部日报》汇总。

一、财政总收入：2019 财年前五个月很大程度上没有变化

CBO 估计，2019 财年前五个月的财政收入总计 12820 亿美元，同比 2018 财年减少 40 亿美元。与上一年度相比，收入总额变化不大，因为抵消了以下来源的收入变化：

1、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社会保险）税总共增加 20 亿美元，增幅低于 1%。

(1) 代扣的工资税收减少 150 亿美元，降幅为 1%。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税收预扣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样更多的抵消了工资和薪水的增长。美国国税局在 2018 年 1 月颁布了新的预扣表来反映税法新的变化，这是 2017 年主要税法（公法第 115-97 号）所做修改的结果。从 2018 年 2 月 15 日开始，所有雇主被要求开始使用新的预扣表。因此，新的代扣缴税率已经在本财年前五个月已生效，但在上一财年同一时段只有一小部分生效。

(2) 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的非代扣部分增加了 90 亿美元，增幅为 6%。本财政年度估计个人所得税的第一季度支付应于 1 月 15 日进行。（这笔款项是 2018 年的纳税责任）

(3) 个人所得税退税减少了 100 亿美元，降幅为 10%，部分抵消了代扣税的下降，并提高了净收入。退税付款的确切时间每年都不一样，但大部分将在 2 月至 4 月期间支付。美国国税局报告称，截至 2 月第三周，发放的退税总数下降了 5%，但平均退税款增加了 1% 左右。

(4) 失业保险收入（一种工资税）下降了 30 亿美元（降幅为 20%）。

2、公司所得税减少约 140 亿美元，降幅为 19%。这一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2017 年税法的变化，该法案将大多数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从此前的 35% 下调到了 21%。

3、其他来源的收入净增加 90 亿美元，增幅为 9%，主要是由于提高了消费税和关税。

(1) 消费税增加了 80 亿美元，增幅为 25%。这一增长反映了对医疗保险提供者的税收支付，其中一些是在 10 月份进行的。该税种在 2017 年暂停一年，并将在 2019 年再次暂停一年。

(2) 关税增加了 140 亿美元，增幅为 90%，主要原因是政府征收了新关税。

(3) 这些增长部分被美联储汇款减少所抵消。它们减少了 120 亿美元，降幅为 36%，主要是短期利率较高，导致中央银行向存款机构支付更多的准备利息。这些较大的美联储支付导致了向财政部汇款较少。

表 2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2 月财政收入表

主要来源(10 亿美元)	2018 财年(实际)	2019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幅度	
			金额	百分比(%)
个人所得税	648	628	-20	-3.0
工薪税	463	484	21	4.6
公司所得税	74	59	-14	-19.2
其他	102	111	9	8.7
合计	1286	1282	-4	-0.3
备注：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代扣税收	1045	1030	-15	-1.5
其他，净退税	66	83	17	25.7
合计	1111	1112	2	0.1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二、财政总支出：2019 财年前五个月增长 6%

CBO 估计，2019 财年前五个月的财政支出为 18190 亿美元，比 2018 年同期增加 1420 亿美元。如果去除上一年度某些付款变动影响，则年度增长将会变得更少，为 990 亿美元，

增幅为 6%。下文的讨论反映了去除这些时间变化影响后的调整。

增长最多的支出项目如下：

1、三大强制支出项目总共增长 4%：

(1) **社会保障福利**增加了 220 亿美元，增幅为 5%，原因是在受益人数和平均福利支付金额数上都有所增加。

(2) **医疗保险**支出增加 100 亿美元，增幅为 4%。

(3) **医疗补助计划**支出增加 30 亿美元，增幅为 2%。

2、**国防部**的军事项目支出增加 240 亿美元，增幅为 10%，主要是用在运营、维护、研究和发展等领域。

3、**公债净利息**支出增加了 200 亿美元，增幅为 15%，主要原因是 2019 财年的利率大大高于 2018 财年同期，并且联邦债务金额大于一年前。

4、**退伍军人事务部**支出(也包含在表 3“其他”类目下)增加了 80 亿美元，增幅为 10%。原因是接受残疾补偿的退伍军人人数和这些付款数额的增长。

5、有关**收入和儿童税收抵免**中的**退税**部分的支出增加了 60 亿美元，增幅为 14%。2017 年税法扩大了儿童税收抵免范围，包括可退税部分，但 2 月份支付的可退税支出数额往往每年都有变化。

支出下降最多的项目如下，包含在表 3“其他”类目：

1、**国土安全部**支出减少了 110 亿美元，降幅为 31%，主要原因是在 2018 财年开始时，救灾支出高于平常水平。

2、2019 年政府从**房利美**和**房地美**收到付款增加了 40 亿美元，这就减少了净支出。这两家企业按季度向财政部付款。

对于其他项目和活动，支出增加或减少的数额较小。

表 3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2 月财政支出表

主要支出(10 亿美元)	2018 财年(实际)	2019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值	调整后变动幅度 ^a	
				金额	百分比(%)
社会保障福利	400	422	22	22	5.4
医疗保险 ^b	223	256	33	10	3.9
医疗补助计划	155	158	3	3	2.2
小计(金额最大的强制支出项目)	778	836	58	35	4.3
国防部-军队 ^c	242	271	28	24	9.5
公债净利息	135	156	20	20	15.0
其他	522	557	35	20	3.8
合计	1677	1819	142	99	5.7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注释：

a. 调整后的金额不包括付款时间在周末或假日而发生提前支付的变动的的影响。如果剔除这些变动，2018

财年的支出将为 17210 亿美元。

- b. 医疗保险支出是抵销收入后的净额。
- c. 剔除了国防部在民用项目上的开支。

三、2019年2月估计赤字：2270亿美元

据 CBO 估计，联邦政府在 2019 年 2 月发生了 2270 亿美元的赤字，比 2018 年 2 月的赤字高出 120 亿美元。

CBO 估计，2019 年 2 月的总收入共 1710 亿美元，同比 2018 年增加 160 亿美元，增幅为 10%。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代扣部分增加 100 亿美元，增幅为 5%，因此增加了收入。个人所得税退税减少了 100 亿美金，降幅为 13%，这进一步提高了净收入。（然而，2 月份支付的数额占退税总额的比例每年都不一样。）美联储的汇款减少了 50 亿美元，降幅为 62%。2018 年 2 月，由于 2018 年《两党预算法案》的规定，发生了额外一次为 25 亿美元的汇款，从而增加了汇款总额。

表 4 2019 年 2 月预算收支表

单位：10 亿美元	2018 财年（实际）	2019 财年（预计）	估计变动值	百分比(%)
财政收入	156	171	16	10.0
财政支出	371	398	27	7.3
赤字	-215	-227	-12	5.3

数据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财政部。

CBO 估计，2019 年 2 月财政总支出为 3980 亿美元，比 2018 年 2 月增加 270 亿美元，增幅为 7%。

根据 CBO 的估计，以下支出项目变化最大：

- 1、有关收入和儿童税收抵免中的退税部分的支出增加了 60 亿美元，增幅为 13%。
- 2、国防部的军事活动支出增加 60 亿美元，增幅为 12%。
- 3、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增加 50 亿美元，增幅为 6%。
- 4、医疗保险支出增加了 40 亿美元，降幅为 8%。

其他一些项目或活动的支出增加或减少的金额较小。

四、2019年1月实际财政盈余为：90亿美元

财政部报道1月财政盈余为90亿美元。CBO没有公布2019年1月的月度预算评论，因为联邦政府从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部分关闭，CBO无法获得一些报告所需的数据。

（摘自 Monthly Budget Review for February 2019, CBO, 2019 年 3 月 7 日，由龚德昱编译）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 2019 年第 3 期内容完]

2019 年 3 月 15 日截稿

2019 年 3 月 25 日于上海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 Governance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的十大高校智库之一，主要为加快学术成果应用转化、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需要服务。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The American Fiscal Studies Institution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以学术创新为导向，整合校内外有关美国政治经济研究资源，专注于美国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科技与产业政策等财经专门领域相关理论、实践问题研究。



智库视野



研究院微信



研究院微博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上海市教委重点支持的上海市十大高校智库之一

主办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

邮政编码：200433

电话：(021) 6590 8706

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

《美国财税动态》月刊编辑部

主编：李超民

责任编辑：熊璞

电话：(021) 6590 3457 / 159 219 91883

邮箱：mcdm@mail.shufe.edu.cn

协办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万盛街 8 号圆融大厦

邮政编码：215028

电话：(0512) 6696 2121